

在华使命

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

〔苏联〕崔可夫著

新华出版社



在 华 使 命

——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

(苏) 瓦·伊·崔可夫

万 成 才 译

陈 启 民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在华使命

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

[苏] 瓦·伊·崔可夫 著

万成才 译

陈启民 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新华社印刷厂排版 建工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00,000字

1980年9月第一版 1980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1203·009 定价：0.45元

内部发行

前 言

《在华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是苏联元帅、现任苏联国防部总监瓦·崔可夫的回忆录，发表于一九七九年苏联《新世界》杂志第十一期和十二期。它记述了作者一九二六年作为苏联外交信使、一九二七年作为军事顾问、一九二九年作为苏联特别远东军司令部工作人员，以及一九四〇年作为苏联驻华武官和蒋介石的总军事顾问先后四次来华的使命及其活动情况。

崔可夫的这本回忆录，较多着墨于他在重庆一段时间的活动，它透露了当时苏联对华政策的动机和目的，以及为此而采取的相应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美苏等各大国之间利用中国的抗战形势，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所进行的公开和秘密、紧张而又复杂的斗争。出于作者的立场，书中对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歪曲和攻击。

本书对了解和研究中苏关系史、了解苏联过去和现在的对华政策有一定参考价值。

本书出版时，个别地方作了删节。

译 者

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五日于北京

第一次出使中国

我第一次出差到中国是在1926年。这不是偶然的。在我26岁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不少经历——在国内战争的南部战线、东部战线和西部战线呆过，负过伤，指挥过一个团。1922年，我和许多国内战争的积极参加者一样，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5年毕业以后，我被留在该学院东方系中国部继续深造。大家知道，那时在中国展开了有千百万农民、工人、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泛的革命运动。我们苏联指挥员在伟大的列宁领导下粉碎了白卫军和击退了外国干涉军的进攻以后，荣幸地参加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和帮助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强盗的斗争。“滚出中国去！”这一口号象自己的、祖国的口号一样深入到我们心中。

我们顽强地、以极大的热情奋发学习，白天晚上都死背汉字，努力掌握汉字的准确发音，仔细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人的风俗习惯。至今我还怀念着我们的老师——科洛科洛夫、梁昆，历史学教授霍多罗夫等。

到过中国的同学经常来我们系给我们讲关于中国的许多

情况。我们也经常到纳里曼诺夫东方大学去参加中国学生的集会，他们争论和讨论关于中国革命的问题。

坦率地说，我们当时对中国的情况还不够熟悉，很难弄清中国革命风暴的全部变化和预见它的进一步发展道路。

1926年，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的一些学员得到了到中国的机会。作为实习，我被指派为外交信使。我要往返于哈尔滨、沈阳、大连、天津和北京之间。请读者把自己置身于那遥远的过去再设想首先穿过整个西伯利亚，然后经过中国东北的漫长旅行吧。

我的战斗青春使我结识了西伯利亚。在那里，在和高尔察克的斗争中，我受到了战斗的洗礼并当上了团长。讨伐高尔察克和其他沙皇将军们的战斗是严峻的。而今，车窗外和平的站台忽隐忽现，村镇医治了战火留下的创伤。火车虽然经常晚点，但是毕竟已经不再按国内战争时期的时刻表行驶了。1919年，我们团从库尔干到莫斯科沿铁路走了一个多月。现在，特别快车——当然，不是今天这样水平的特别快车——七昼夜就把我们送到了满洲边境。从那里我们换乘中长铁路的火车。

我们穿过了国境，但是马上还感觉不到车轮底下已经不是俄罗斯土地，也看不出地貌的明显变化。然而，很快，当我们在火车停站后从车窗往外眺看时，我们便不再怀疑已经置身于另一个世界。这里，生活仿佛已经窒息、停顿了。蓦地，我们好象倒退了好多年。

穿着佩戴肩章军服的俄国军官在车站上徘徊。他们是与

高尔察克军队和其他将军的军队以及帝俄哥萨克首领的军队一起被赶出国外的。中国当局收留他们，让他们护路。他们身着旧装，伺机以待，指望有朝一日参与匪首谢苗诺夫或者麦尔库洛夫的哥萨克军队重新向布尔什维克俄国发起进攻。

我们好奇地打量他们的仪容：精心保存的军服和枪只。军服已经退色、破旧、褶皱不堪了，沙皇俄国军官一向特有的那种神气已不复存在。他们的目光警觉而含敌意。他们在旅客中一眼就认得出俄国人，甚至认得出外交官——他们仇视的苏维埃国家的全权代表。然而，那毕竟是祖国，感觉得到，他们在怀念祖国。在异国他乡，他们感觉不到太阳的光辉，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想以胜利者的姿态返回把他们驱出大门的祖国的希望也在破灭。但不是所有的人都带着仇视的目光，另一些人的眼神反映了他们绝望的忧伤。回国吧，跪在祖国——母亲面前忏悔吧，但报复、惩罚使他们不寒而栗，因为他们对祖国，对俄罗斯人民犯下了许多罪过，一些人则犯下了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

就这样，我和老布尔什维克罗日科夫一道作为外交信使前往北京。在列车上，我们经常发现我们的同胞对我们以白眼相待——他们认出了我们是俄国人，知道我们是布尔什维克，而有些人则在猜测我们此行的目的。罗日科夫建议我把手枪准备好。

哈尔滨到了……

危险的旅程还在后头。领事馆的工作人员在车站上迎接我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喘一口气和游览市容了。

哈尔滨——这是当时满洲的一个商业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是满洲的首府，同时又是走私活动和间谍活动的中心。整个城市是一个大黑市，公开贩卖外币、麻醉品、武器和人。在这里，一切都成了商品。来自世界各地的东西，无所不有。法律禁止偷税漏税的贸易。然而，没有一个官员不因为受贿而同意违反法律。象在哈尔滨那样道德行为的堕落，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了。

城里有许多俄国人，他们不都是侨民。许多人是从修建中长铁路时起就定居在这里的，一些人就生长在这里。他们的语言和通常的俄罗斯语言大不相同，在口音和语汇方面都是如此。俄罗斯语汇常常混杂着英语、法语、甚至汉语词汇。当地的一些俄国人请求允许他们回国。他们向领事馆递交了申请接收他们加入苏联国籍的报告。尽管反动的白俄逃亡者总是用“布尔什维克的暴行”来恫吓他们，但他们并不敌视俄罗斯和布尔什维主义。在接受申请加入苏联国籍的报告时，领事馆发给特别收条。白卫分子嘲笑这些暂时还没有被接受加入苏联国籍的人是收条国民。

哈尔滨是一个对比鲜明的城市。一方面，是在最冒险的投机买卖中赚取巨款的富翁。他们在大发横财之后就搬迁到比较安静的地方去。另一方面，是成群的乞丐。工人也过着半乞丐的生活。中国工人把能在中长铁路苏联管理局得到工作视为幸运。这里有工会组织，工人得到比一般较高的工资。

那时候，我们都仔细观察哈尔滨是否存在革命形势，哈

尔滨工人是否准备采取有组织的抗议形式？可惜，感觉不到任何这种反抗的明显迹象。黑市和警察恐怖的猖獗、白卫分子的兴风作浪席卷全城。

我在哈尔滨逗留了五天，然后我们出发，经沈阳、大连去北京。在长春站，我们由中长铁路转南满铁路。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以前，中长铁路和南满铁路是一条统一的铁路。这条铁路是沙皇政府修建的。后来，根据朴茨茅斯和平条约，南满铁路——从长春到旅顺港——移交给了日本。日本人成了这条铁路的全权主人。出现了类乎国中之国的东西。中国人只是作为工人在铁路上干活。

日本人对铁路实行军事化。这使他们得以维持秩序。火车按时刻表准时运行，并备有餐车。车站上再也看不到拆下肩章的白卫分子、浪荡的妓女和醉汉了。

但是，铁路是为富人服务的。票价非常昂贵。餐车上备有佳肴和高级厨师。但这只是为富人享用的。饭菜是如此之少，以至俄国人要吃两三份才不致于饿着肚皮离开餐桌。

大连港与毗邻的旅顺要塞（旅顺港）位于辽东半岛南端，曾经租借给沙皇俄国。由于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结果，这两个港口转归日本，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在中国领土上的日本城市。它们同中国城市的差别迥异。大连是个具有现代建筑的设施完善的城市，是一个用先进设备装备起来的不冻港。日本人兴建了工厂，扩建了旧厂，当局的工作组织得井井有条。乞丐也够多的，但是，他们不敢在主要大街上露面。极少碰到俄国人，白卫分子在这里不被赏识，他们被

当作炮灰送到离俄国边界附近的地方，以便对苏维埃国土进行军事袭击，或者用他们补充间谍骨干。日本人有中国工人就足够了——他们既廉价又安分守己。日本人榨干了他们的脂膏。他们无处诉怨，也不会卫护自己的权利。日本当局禁止工会活动。在那些年里，在大连听也没有听说有地方共产党。

城里有许多欧洲人，是来旅行的或者是乘商船来做生意的。海滨浴场尽是入。

在这里，我头一次在实践中了解到日本反间谍机关的工作。它采用独特的方法，与西方侦探机关的方法大相径庭。例如：在对我们进行严密监视时，日本密探并不想掩饰。他们跟踪，只隔两步，公开示意他们在跟踪我们。事情闹到令人可笑和懊丧的地步：我们来到海滨浴场，脱了衣服，下水中游泳，而日本人就尾随于后。

侦探们十分殷勤。如果散步时想要吸烟，他们会马上递过火柴来。他们不想妨碍我们任何事情，但也不离开我们一步，直送我们到领事馆门口。在领事馆门口，他们向我们笑容可掬地点头施礼，然后回到自己的监视哨等待我们再出来。太好了！

到了大连以后，我们取道海路。我们带着外交邮件上了日本客船。我们所乘的船要绕过辽东半岛，在离天津不远的塘沽港靠岸。

我从海上看见了旅顺港。轮船在那里不靠岸。我非常想到市里去拜谒在保卫旅顺的战斗中阵亡的俄国英雄纪念碑。

但是，旅顺的大门那时对苏联人是关闭着的，因为它是日本的海上要塞。

在进入塘沽港之前，我们遇上了一场狂风暴雨。在那些年我的身体结实得能经受住颠簸。然而，同志们却晕船晕得厉害。从天津到北京是乘的火车。

在1926年称北京为中国的首都只是约定俗成而已。在这个国家里，革命浪潮汹涌澎湃。1926年7月，南方革命政府开始北伐，北伐军取得不小战果。

在我们抵达前夕，北京统治者的地位大大动摇了。北京处于中国的两个军阀张作霖和吴佩孚的军事控制之下。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者都支持这两个军阀，指望借他们的帮助巩固和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特别是满洲的统治者张作霖面向日本，把日本当作比较亲近的邻邦来依靠。指出以下一点并非多余：当张作霖的政治影响下降，他和他的庇护者产生磨擦的时候，他被不客气地除掉了——1928年张作霖死于日本有关部门安排的火车被炸事件。

1926年秋天，吴佩孚的军队受到来自南方革命军队的攻击，遭到沉重失败。北京充满了不稳和捉摸不定的气氛，尽管这不是立刻就能看到的。北京政府的官员们竭力显示殷勤好客和地位的稳固。市场剧烈动荡。旧的银行倒闭了，又马上出现新的银行，不断发生大规模的金融舞弊。企业家处心积虑地靠工人的苦力来榨取最大利润。而与此同时，在使馆区——外国人在中国土地上的领土，即国中之国的生活表面上是平静的，有节奏的。中国人只有在特殊情况下凭特别通

行证才能进入使馆区。在使馆区住有外国军队，专属使馆区管理局管辖的特别警察。外国人以保安为由而被完全隔绝于中国生活之外。

贫富悬殊的对比使我感到震惊。我不能不以对人的尊严遭到凌辱的痛苦心情，目睹人力车夫的劳动。不能想象，我们共产党人可以享受别人的牛马劳动。有一次，我们的使馆工作人员想要辞掉人力车夫。他们知道后，痛哭流涕地请求我们的大使馆取消这一决定，因为这将使们失去挣钱的机会。结果不得不同意人力车夫们的请求，但是，不忍雇用他们的感情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我第一次中国之行中看到的北京、天津和其他城市像是火药桶。革命是能够结束人民无权状况的唯一手段。在北面，苏维埃国家为怎样做到这一点提供了榜样。

1927年秋天，我和我的同学们结束了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的学习。院部认为我们可以到中国去工作了。尽管那里的形势非常复杂（这时，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反革命政变，武汉的国民党也背叛了革命，而在八月爆发了南昌起义），仍然决定派一些军事顾问到中国共产党有影响的部队中去。

自从我国的军事顾问抵达中国并在广州的军事学校（指黄埔军官学校——译者）开始工作以来，时间还不长，对建立一支干部队伍来说，时间是很不够的。但是，在北伐战斗中，在某种程度上说，有些部队和连队显示出它们能够成为真正革命军队的骨干。首先，共产党的队伍与国民党军队不

一样，他们不是雇佣来的。他们不是凭某个军阀的灵机一动建立起来的，不从属于象雇主一样的指挥官。他们是由那些懂得什么是革命，懂得革命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些什么的志愿者们组成的。中国士兵坚毅、勇敢，革命理想激励着他们。他们努力学好军事，理解自己的指挥员，尽一切力量去完成战斗计划。但是，应该指出，透彻了解革命目的的人极少。对许多战士来说，革命只是体现在解决他们个人的命运和其亲友的命运之中。革命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农民往往是文盲或者半文盲，不大搞得清楚各种革命的差别，不透澈懂得为什么蒋介石不能容忍共产党人，只是后来才认识到，蒋介石完全背叛了革命并转到敌人营垒中去了。

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作了多次旅行。我有机会到过北京、天津地区，去过四川省，走遍了几乎整个华北和华南，学会了一口相当流利的中国话。

1929年，爆发了有名的中长路冲突事件。铁路上的苏联职员遭到了警察当局的各种凌辱和攻击而被从中国招回。不允许我们一行经满洲回国，不得不取道日本回国。

大概，那时我是首次看到，中国的官吏，甚至普通职员都是彬彬有礼的。可以理解，官吏们受过盲目服从长官的教育，官僚等级制度早就在中国牢牢扎根。但是，甚至搬运工人都回避我们。我们在全国各地活动宛如在旷野里一般，人们对我们视而不见，而那些应当关照我们的人倒是寸步不离。警察和便衣警察左右随行。他们没有冒犯失礼的言行，但眼睛里却闪着仇恨的寒光。

中长铁路事件

1929年8月我和同志们一道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①。受特别远东军司令部之命，我们立即赶赴哈巴罗夫斯克②，特别远东军司令部就设在那里。当时，苏中边境的形势十分紧张，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远东军由勃柳赫尔③指挥，参谋长是拉平。勃柳赫尔和拉平都是早在国内战争时期就认识我的。通晓汉语和了解中国情况的人被暂时调到远东军参谋部工作。

局势一天天激化，眼看来自中国方面的已经不再只是挑衅性的个别强盗式袭击，而是公开的军事进攻。

此时是要动动脑筋的。广州革命政府特使团团长江介石④到莫斯科和我国领导人就关于对中国革命的军事政治援

① 海参崴。——译者注

② 伯力。——译者注

③ 加伦将军。——译者注

④ 1923年8月孙中山先生派蒋介石为首的特使团（其中有共产党员张太雷）前往莫斯科学习苏联的经验并进行具体的军事政治会谈——原注

助问题进行会谈以后，已过去六年了。嗣后，蒋介石热烈欢迎我们的顾问，他清楚地认识到，没有苏联教官的帮助，国民党不可能打败数量众多的敌人和建立一支正规军。苏联军事顾问拟定了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计划，在和北方军阀部队作战的无数战役中，他们都和革命军在一起。我问自己：是什么东西促使蒋介石对我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呢？

无须寻求政治上的解释。对中国共产党人的仇恨同样发泄到我们身上。蒋介石明白，苏联正在援助并将继续援助中国共产党的正义斗争。所有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可能他和苏联还有其他矛盾。但是，在中国进行激烈国内战争的情况下，这一切还不是侵犯北方邻国的根本原因。不容争辩的结论油然而生：蒋介石的军事行动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采取的，它们想用中国人的刺刀来试探一下红军的实力。也不排除蒋介石本人企图试探一下我国在远东的实力。我们的远东军能否击退入侵，或是我们立即作出重大退让？这次“战斗侦察”是不是为更严重的侵犯开路？一旦中国军队得逞，日本会不会出动自己的军队呢？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把日本拖入苏联远东的长期战争之中，同时利用日本的支持来解决与中国共产党斗争的内部问题。想来，白俄侨民对蒋介石下决心向苏维埃俄国挑起武装冲突起了不小的作用。他们使蒋介石相信苏维埃国家及其红军是软弱可欺的。

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我们的军队被迫对集结在边境沿线的中国军队分头进行小规模的反击。同时，我们要尽量不给帝国主义宣传以王牌，因为它们竭力把事情描绘成似乎苏

联在中国追求某种掠夺性的目的。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迫使蒋介石尊重中国方面接受了条约义务①。

大家知道，后贝加尔铁路从赤塔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要沿中国边境运行几千公里。它把我国远东和中部地区联系在一起。这条铁路在有些地方离中国边界只有几公里。此外，能通航的阿穆尔河②和乌苏里江以水上交通把后贝加尔和苏联远东的许多地区联系起来。

中国军队在边界上集结和对我国领土的不断袭击不但引起了我国边境居民的不安，而且有使苏联远东和中部地区的联系中断的危险。

尽管我国提出多次警告，袭击仍然不断。中国炮兵炮轰我国领土。被俘的红军战士受尽了残酷虐待，至今回想起来令人可怖和痛心——割舌头，把子弹钉进眼睛和耳朵，活活烧死……我国政府提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抗议。

于是，1929年7月1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向中国驻苏联代办递交了抗议照会，照会中同时表示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冲突的愿望。

“苏联政府获悉，——照会说，——7月10日凌晨，中国当局袭击了中长铁路并占领了全线的电报设施，中断了同苏联的电报联络，不说明原因就关闭和查封了苏联贸易代表

① 根据1924年5月中苏两国签订的协定，中长铁路为纯商业性企业，由两国在均等原则上共管，直到中国政府赎回为止。——原注

② 黑龙江。——译者注

处以及国家进出口分局，纺织业托拉斯分公司、石油托拉斯分公司和苏联商船队分部。嗣后，铁路督办（中长铁路董事长）吕中皇* 要求中长铁路局长叶姆沙诺夫把铁路的管理权移交给督办指定的人……

“同时还获悉，满洲军队正在沿苏联边境集结，已经进入战备状态并且向边界逼近。据悉，和满洲军队一起驻扎在苏联边界附近的还有白俄部队，满洲司令部企图派遣他们进入苏联领土……。

“尽管中国当局采取暴力和挑衅行动，苏联政府仍然忠于自己的和平政策，再次表示愿意就有关中长铁路的全部问题同中国进行谈判。但是，这样的谈判只有在立即释放被捕的苏联公民并取消中国当局的非法行动以后才能进行。”

但是，蒋介石政府和与他休戚相关的军阀，特别是满洲的独裁者张学良不急于缓和局势。1929年7月17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被迫召回在中国的所有苏联代表和工作人员，并驱逐蒋介石政府的驻苏代表。苏联政府和蒋介石后来的谈判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的，特别是通过德国驻莫斯科大使迪克森进行。苏联政府的提案具有和平性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每一次呼吁都包含有为了和平解决冲突而进行谈判的建设性意见。然而，中国侵略集团以及支持这个集团的人把事情搞到爆发武装冲突的地步，而苏联政府的爱好和平被他们视为软弱。

* 据音译。——译者注